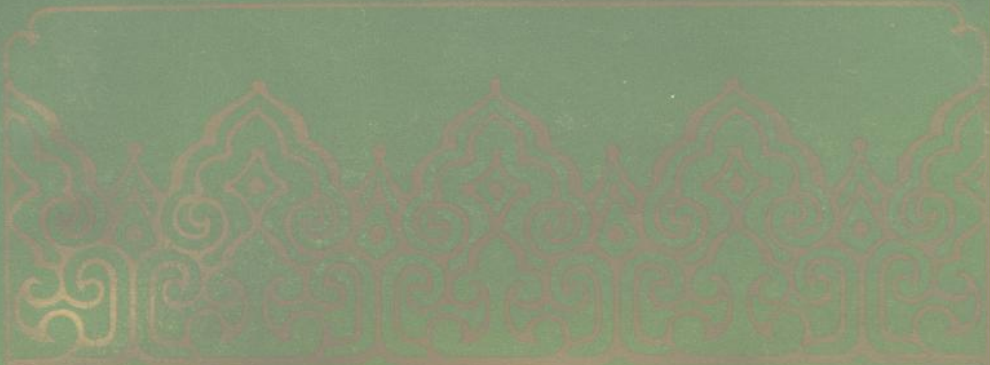




天国史事释论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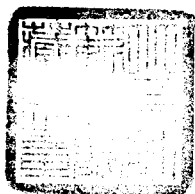
天国史事释论

邢凤麟 邹身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9137



学林出版社

999137

书名题字：赵朴初

封面设计：甘晓培

天国史事释论

邢凤麟 邹身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36,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11259·003 定价 2.25元

DBol/012

目 次

序 罗尔纲(1)

太平天国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3)

《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的宗教思想 (14)

太平天国杂考两则 (38)

试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满族问题 (50)

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 (72)

太平天国与瑶族 (95)

论太平天国法制并未超脱封建主义范畴 (102)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物价浅探 (111)

论太平军对游民的改造 (116)

太平天国的文学改革 (131)

绍兴太平天国壁画辨疑

——兼论史料的调查和研究 (143)

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若干问题 (163)

论洪秀全为杨秀清平反昭雪 (195)

论冯云山

——兼谈拜上帝会一些有关的问题 (201)

萧朝贵与太平天国	(234)
论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战略	(243)
石达开的“爱民”与大渡河的悲剧 ——评石达开远征与西南少数民族	(251)
太平军北伐主要将帅位次问题述评	(268)
胡以晃并非死于天京内讧	(280)
论天京事变中的关键人物陈承谔	(289)
陈承谔问题续篇	(301)
莲蓬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史事考	(305)
《越难志》考跋	(347)
太平《辛壬寇纪》考跋	(385)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方在北方战场的军事调整	(413)
戈登发迹史剖视	(428)
后 记	(444)

序

邢凤麟同志和邹身城同志合作选编了他们两人的学术论文集《天国史事释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要我写篇序言。他们两人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在史坛上比较活跃，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作了相当的努力，现在总结一下成绩，明确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多作出些贡献，这是一件可喜的事，而为老一代人所殷切期望的。

邢凤麟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他既重视理论，又紧紧地掌握论从史出的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不薄政治厚学术。在研究上深入细致，勤奋撰著。他在出版《冯云山传》等书之后，接连发表了不少理论性学术性较强的论文，这是我看过的《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试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满族问题》、《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若干问题》、《石达开的“爱民”与大渡河的悲剧》等论文后，得出的印象。邢凤麟同志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他还参加许多区内外的学术会议。他不曾因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而妨碍他的研究，却夜以继日地经常苦作到深夜不休。他今天的成就，是从他的刻苦努力中来的。

邹身城同志对于方志学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积累了较多的资料，作了较为细致的考释，具见功力。他不囿于成说，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发挥独立思考的求真精神。他在出版《太平

天国史事拾零》、《地方志和方志学》等书外，接连发表了《洪秀全初读〈劝世良言〉时间考》、《论太平天国法制并未超脱封建主义范畴》、《论天京事变中的关键人物陈承谔》等篇具有见解的论文，也是中年人中一位比较多产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是在完成教学工作或编辑工作的同时取得的。这种苦干精神，我是十分钦佩的。

邢凤麟同志和邹身城同志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勉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们两人合作出版这本论文选集，就是基于这种协作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上，这种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学林出版社对中年人的学术研究著作给予充分的重视，并提供了出书的方便，这对于保证学术研究工作的承上启下，不断繁荣发展，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远见。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

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

太平天国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邢 凤 麟

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向纵深发展、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进一步开展资料的收集、整理、交流和出版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地方资料和国外资料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充分了解和利用国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科学成果；进一步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提高；进一步扩大研究的领域，向广度深度进军，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背景、宗教哲学的特点、国体和政体、经济政策、军事思想、历史作用、国际影响，以及清朝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政策、策略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共同推进太平天国史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是，从战略观点上看，进一步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指导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提高，则是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带根本性的工作。对此，有的同志还有怀疑，认为马列主义是“虚”的，考证才是“实”的，因而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虚”就“实”，重考证，轻马列。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太平天国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列主义和考据方法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问题。

众所周知,清代的考据学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称为乾嘉学派,正如范文澜同志指出的,“这种考据学使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更不必期待它能发现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了。”在太平天国史的微观研究中,考证工作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基础工作。史料的搜集、整理、选择和编纂、史迹的鉴定,乃至史事的辨伪,都需要借助考证工作来进行。没有资料,是无米之炊,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成为空谈。有了资料而不认真考证,可能以假乱真,这比无米之炊更危险。现有的太平天国史料,其主要来源:一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这是有关太平天国信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但这部分资料数量不多,而且由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和别的原因,一些问题有所隐讳或曲笔。二是清方(包括封建文人)和侵略者的外交官、传教士的记述。这类资料数量不少,占太平天国史料的大部分。但由于阶级偏见,许多资料是歪曲、诬蔑或伪造历史的。三是后人的传闻、革命党人的宣传、好事者的编造和后代统治者的盗改,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对后世影响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真假互混,比较复杂。所以,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是一件艰深繁难的工作。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同志和简又文先生,在这方面,可以称得起是两位集大成者。他们毕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考证工作,著述汗牛充栋,都在四五百万字以上,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整理和辨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充分肯定考据工作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是说考据工作就是我们整个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方向了,更不是说考据工作可以代替马列主义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了。在这方面,罗尔纲同志的经验体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1931年秋,他从考证张嘉祥的史料开始,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不敢说那时候我

就有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但我却有为学术而献身的愿望。”他早年曾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接受过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中，他肯定了太平天国“贫农革命”的性质。解放前他出版的七部论文集，否定了伪科学的诡辩术，坚持了形式逻辑的考据方法，“去做披荆斩棘的清道夫工作”。解放后，他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1952年他写了《初步批判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文，认真总结了解放前自己纯学术研究的考据方法，决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太平天国史。1956年他在重新改写了解放前出版的主要著作之后，总结自己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经验体会，又写成《论考据》一文，系统阐明了考据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亲身的经历说明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指出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考据工作，“批判地接受了旧考据所用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它把这些方法祇作为技术性的方法”，而“起领导作用的乃是唯物辩证法。指导考据的已不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是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但考据史料，还考据史事”；“不但考据史事的现象，还进一步考据史事发生的底蕴，考据那些支配史事的规律”。罗尔纲还说到他从使用旧考据方法过渡到学习使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据的方法，“这是一个极艰苦的过程”。他解放后出版的大量著作，可以作为这方面源源不绝的例证。简又文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中，说罗尔纲在解放后“继续努力研究太平史不断不懈。其大部分工作仍为考证解释史料与遗物。可是他的思想和方法完全变了——不知道是由于环境或威力所迫，抑由于甘心效顺——完全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竟是前后两人。”剔去政治偏见，可以看出，罗尔纲悉心研究太平天国史，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合乎人民的需要，坚定不移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不断提高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同

时,用大量的科学成果,回答了简又文等人公开否定马列主义的所谓“勇猛地、不妥协地挑战”,为捍卫马列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以,罗尔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的科学研究,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马列主义对太平天国史的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考据工作中,而且体现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如罗尔纲指出:怀疑马列主义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因而坚持单纯的考据方法,运用形式逻辑来表达思想观点,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首先,单纯的考据,往往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缺乏联系地全面地看问题。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才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从而避免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太平天国史料五花八门,社会生活错综复杂,毁誉臧否千差万别,客观地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区别的复杂性。单纯的考据由于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往往容易把问题片面化。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土客问题,单纯的考据考明了土客之争的起因、经过和客家人失败后直接参加金田起义的事实,得出了客家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结论。这个结论并不全面。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土客之争问题的加剧,与乾嘉以来人口急剧增长、佃众田稀日益严重和鸦片战争失败后,剥削加重、土地和财富加速集中,以及封建统治危机加深、为了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而采取挑拨离间的政策所造成的。土客人民虽有矛盾,但都是受害者,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太平天国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和“天父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的主张,自然得到土客人民的响应。事实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是土客人民共同参加和发动的。由此可见,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运用上下左右前后三段空间的科学方法,既看到客家人民的革命利益,又看到土籍人民的革命利益;既看到土客人民共同的革命要求,又看到太平天国联合土客人民进行共同斗争

的革命主张，从而避免了单纯的考据的片面性，得出比较全面、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其次，单纯的考据往往从现象看问题，而难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达到本质的认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单纯的考据是在直观的范围内表达思想观点的，往往容易为历史现象所迷惑，或把历史问题表面化。例如：关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问题，有人运用单纯的考据，考出了杨秀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利用代天父传言的宗教迷信作为争权的工具，取得了太平天国的指挥权和决策权。显然这是一种夸大个人作用和宗教作用的唯心史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起了不同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前期，主要地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而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才从一种斗争的武器逐步变为争权的工具。这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农民领袖逐渐封建化是密不可分的。说明了思想斗争反映了并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实质。从总体上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宣扬了先验的天命思想、僵化了的上帝天道和救世主上帝的唯心史观，本质上是落后的、保守的，麻痹群众斗志、加强专制主义、加深领导核心的矛盾，成为天京事变一个重要的原因，说明利用宗教迷信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实际的主持人，既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又是杨秀清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杰出的作用而为群众所拥戴出来的。并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就可以利用代天父传言而取得太平天国的指挥权、决策权的。杨秀清后来利用代天父传言逼封万岁、争权夺利，失去军心民心，终于被杀，就是一个幽默的讽刺，说明只有革命和人民的拥护才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那种归结于杨秀清个人的思想动机和夸大宗教的作用的观点，实际上是用迷信说明历史。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用历史说明迷信。

复次,单纯的考据往往绝对化地看问题,缺少从矛盾对立中分析解答问题。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从矛盾对立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问题。单纯的考据,“是则是,否则否”,往往是一点论、一刀切。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照旧交粮纳税”的问题,有人经过考证,肯定了太平天国这个政策是实行了的,并得出它与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相同的结论。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现象是有区别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中,由于阶级结构的变化、土地占有关系的更迭和户簿粮册的变动,所谓“照旧”就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了。有的地区农民占有走死逃亡的地主的土地,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承认“以实种为准”,实行按亩输粮,这对农民是有利的。有的地区规定“业主不得挂名收租”,农民“只交长毛粮,不复交田主租”,这也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有利的;有的地方地主收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或抵制,地主收租“如乞丐状”,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提高了,这与旧的封建剥削关系也不能等量齐观。当然,也有的地区出现过太平天国地方政权设局帮助地主收租和镇压农民抗租的情况,表明一些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或是原来就被封建势力所把持,或是已经封建化了,这样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有利于地主而不利农民,和过去就是一样的了。可见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不同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历史现象千差万别,用一刀切的考据方法,就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了。事实上,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与旧的封建剥削制度是有联系和区别的,虽然具有一定的封建性,但是总的说来,对农民有利,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达到了“裕国课而充军需”的目的。对这个政策,分析批判其封建性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策应该肯定而不应否定。

再次,单纯的考据往往是静止地看问题,缺乏从发展观点上看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指导我们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而避免静止地看问题。任何事件、制度、人物，如果没有发生、发展和变化，也就没有历史。例如：对韦昌辉的评价问题，有的同志考证出他出身地主，进而把韦昌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说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和天京变乱的罪魁祸首，把他在金田起义中的作用也一笔勾销了。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家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烙印，他在天京事变中扩大矛盾、滥杀无辜、专横跋扈，从阶级根源上不能说与他的地主出身没有联系。但是，实事求是地评价韦昌辉，他在金田起义时，毁家纾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太平军，而不是反对革命。从金田起义到天京事变以前，他在多年的反清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中，与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一致，在军事上临阵指挥、作战勇敢、杀敌立功。所有这些事实，大概也就是后人在金田村为韦昌辉立庙纪念，并在对联中称他“金田起义志倾清室”、“天国告成位列北王”的缘由。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从韦昌辉前后期的发展变化评价他的是非功过，避免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唯成分论、血统论，从而把韦昌辉复杂的一生简单化和脸谱化。

再次，单纯的考据，往往容易忽视和掩盖阶级斗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根主线。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把主线任意扩大，是不对的。但是，阶级斗争的主线抽掉了，历史就变得脉络不清，好象患了水肿病。例如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有人经过考证，解决了太平天国是否进行了反满斗争和反满斗争的色彩浓淡一类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太平天国反满斗争的阶级实质，结果把太平天国的反满斗争和地主阶级的反满派以及资产阶级反满派混同起来，把太平天国革命说成是反满的民族运动，否定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性质。根据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斗争,是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清朝的民族压迫剥削政策下,所形成的满汉民族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提出“恢复大夏”、“用夏变夷”的斗争要求,带有民族斗争的一定形式和包括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民族斗争的特殊内容。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斗争,其作用和影响不仅限于汉族的人民,而且得到了被清朝民族压迫的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广泛响应,形成了各族人民联合斗争的革命高潮。回避或否认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问题,实际上是回避和否认中国存在多民族的事实,掩盖了清朝民族压迫剥削的政策。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纲领,不是反满,而是反封建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满斗争从属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这就在阶级关系上,把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斗争与地主阶级反满派、资产阶级反满派的政治分野区别开来。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斗争,猛烈地抨击清朝对汉族人民的掠夺剥削,同时尖锐地揭露清朝对满族人民也竭尽搜括之能事,指出:“以(华民)渔课化为花粉,每年定例八百万两”,满族的老家“胡梓里之长白山每年亦定收八百万两”。这就反映了满汉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斗争,实质上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可见,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对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才能在肯定民族斗争的一定形式和特殊内容的同时,从五花缭乱的民族色彩中,看清它的阶级根源和反封建斗争的实质。

最后,单纯的考据往往忽略和轻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充分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活动的舞台。但是,单纯的考据往往只能凭借着片断的、甚至是歪曲诬蔑人民群众的史料来研究历史,这是无法总结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经验的。例

如石达开出走远征后在大渡河的悲剧，有人考据出石达开远征军大渡河覆亡的原因，是由于山洪暴发、抢渡失败，或误入绝境、被制死命，或战略错误、孤军深入、终于被歼，等等。这些天时、地理、军事的因素，无疑是石达开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石达开的失败，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石达开大渡河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屯驻长达二十七日，其中山洪暴发只有短暂几天，绝大部分时间并非洪水期，所以不能夸大天时的因素。石达开在紫打地，除北面为大渡河阻隔外，其他三面都有僻岭或清军防守力量薄弱地区可以突围出险，并非完全是绝域。所以夸大地理因素也是不妥的。时人薛福成的《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就指出：“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灭。”石达开在自述中还说：“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击败。”可见石达开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进入西南民族地区后，未能处理好复杂的民族关系，未能发动和组织西南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共同的反清斗争，结果粮尽援绝，食及战马、树根，军心涣散，最后被彝藏族的练勇配合清军所围杀，全军覆没。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而在大渡河又扮演了悲剧的角色。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认清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才是石达开所率太平军的生存、发展和成败的关键。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运用考据的方法，诸如解释概念、鉴定史迹、辨别史料，乃至人物的褒贬、制度的得失、事件的是非和问题的真伪，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不会在沙滩上建房子。作为技术性的单纯考据，运用形式逻辑思维的科学方法，解决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达到对历史现象的一定的认识。这是太平天国史的一种微观研究。肯定和重视考据的科学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太平天国

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而且有利于形式逻辑的正确思维的运用和发展，从而为应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考据不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中唯一的和最主要的方法，而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考据所运用的形式逻辑，在逻辑思维中，恩格斯称它为“初等数学”。所以，那种把考据工作和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夸大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唯一的和最主要的方法，是不妥的，这不仅不能提高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科学水平，而且还有可能迷失方向和降低要求。应该看到，考据所运用的形式逻辑思维，由于把研究对象建立在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基础上，由于不是联系地而是并列地观察问题，因而不完善的、不彻底的，甚至限制视野、还可能束缚思想，无力解决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本质问题、规律问题和经验教训等问题。所以，要把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引向纵深发展，仅用考据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从根本上说，必须靠逻辑思维中的“高等数学”，即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能达到新的广度、新的深度、新的高度，提出新的创见；才能审时度势、辨别方向、贯古通今，总结出规律性的结论和新鲜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太平天国史的宏观研究，是太平天国史微观研究的发展和提高，从深入开展太平天国史研究来说，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方法。那种否认太平天国史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恰当地夸大考据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以此贬低和否定马列主义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包括考据）的指导作用，认为考证是“实”，马列主义是“虚”，这种“虚实观”显然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不仅见木而且见林，不仅见并列而且见联系，不仅见静态而且见发展变化，不仅见现象而且见本质，不仅见史事而且见规律，比起单纯的考证具体问题来，应该